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首页
- 学报概况
- 编委成员
- 编排规范
- 编辑学坛
- 编读往来
- 学报内容
- 在线投稿

学报内容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作者 : 宗廷虎 添加时间: 2006-3-3 19:45:25 点击: 1078

[标题]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所属年份] 1999 年 第4期

[作者] 宗廷虎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摘要] 80年代以来, 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被公认为登止了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底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部书由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琦、宗廷虎主编, 陈光磊副主编, 它标志着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水平。本文着重探讨了陈望道修辞学米思想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重大影响, 包括对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 特别是对《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影响。作者还回顾了《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缘起、写作原则及研究修辞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学米意义。

[正文]

80年代以来, 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论著迭出,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点,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上周延云先生《论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一文中, 已有精当的评述。1998年底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郑子琦、宗廷虎主编, 陈光磊副主编)在八九十年代修辞学史著的基础上, 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修辞学史作了更为详尽而深入的论述。国内外对此已发表书评一批。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林万苦教授在该国《联合早报》上撰文, 认为这套书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上的“空前盛举, 备受各方瞩目”。《复旦学报》也于1999年第4期特辟专栏予以评介。中国修辞学史研究二十年来为何能取得颇大的进展, 追溯起来, 我们认为与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断影响有很大关系。本文着重从此角度进行探讨。

一、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是历史的总结, 也为未来开拓了新里程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作者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 对它们进行融合贯通之后的进一步深化。《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对我国古代修辞理论的继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善于发掘.广泛吸纳

据大概的统计, 《发凡》总共引用我国古代修辞论说172则.吸收的内容比较全面, 它们涉及修辞理论、词句篇章修辞论、辞格论、文体风格论等多个领域。

以修辞理论为例, 《发凡》引了诸多古人探讨文质关系的理论, 有的论著经过《发凡》的引用, 为世人珍重。如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六)引武叔卿的话:“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蔽, 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 若修之而意反以蔽, 则宁拙毋巧可也。”指出当“质”与“华”、“拙”与“巧”发生矛盾时, 则宁取前者。也就是王安石《上人书》中所指出的:“诚使巧且华, 不必适用。诚使适用, 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即修辞的目的要为“适用”服务, 绝对不能主次颠倒。这一理论可说抓住了修辞的根本。再以词句篇修辞论为例,

●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查询

● 目录查询:

2005 年 01

关键字

查询

● 按年份查看: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发凡》论及文章衔接时，引唐彪《读书作文谱》(五)中的话指出“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数句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气即不贯”，这些论述，均是从写作实践中归纳出来，因此颇有说服力。再如《发凡》集录记载古人有关辞格的现象，谈及比喻、借代、双关、引用、夸张、倒反、婉转、避讳、析字、复迭、对偶、错综等23个辞格。有的辞格，连名称也是比较了古人的多种论述后才确定的。如“借喻”，《发凡》举出元代陈绎曾《文说》称为“隐语”，明代杨慎《丹铅总录》称为“譬况”，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又称为“暗比”，这些称呼，《发凡》认为“或太浮泛，或同别人的譬喻名称不很连贯，都觉得不太适用。”后来还是采用元代范德机《木天禁语》的说法，把它定名为“借喻”。

(二)如实反映学术争论

如有关“节缩”辞格，《发凡》先举清代钱大昕《养新录》(十二)中指出的汉、魏以后，历代文人运用节缩不当的例多达几十个。接着指出，清代顾炎武是把节缩骂得最厉害的一个，称这种“剪裁名字为‘不通夕’”(《日知录》二十三)，这就失之于偏颇。但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二中反批评顾炎武等人“浅陋无知”，不懂这种手法的妙用。再如关于排比，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曾经批评《谷梁》中的有些文字运用排比句“太烦赘”，主张不用排比句，以类逆来代替。清代魏际瑞的《伯子论文》评论说：如果按照刘知几的改法把排比句删除，“这样简是简了”，可是“神情特不生动”。列举了古人不同观点的争议，为正确取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辩证对待，批判吸取

《发凡》对古人的论点并非一味地继承，而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对不妥当的论述展开批评。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认为：“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发凡》抨击说，“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指出在礼拜文言的时期，“轻蔑语体（口头语言）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但语’，这是不奇怪的。又如《发凡》引王安石《上人书》：“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批评它为“装饰说”。同时，《发凡》还多处引用元代王若虚《浮南遗老集》和唐彪《读书作文谱》中批评古人语言运用失当之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四)对宋代以后的修辞理论，格外予以重视

陈望道先生曾经对我们说：“我研究修辞，对宋以后的比较留心，因为宋以后的修辞研究特别发达，值得推敲。”①《发凡》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在全书所引古人有关修辞的172条论述中，宋以后的即有131条，占76%以上，究其原因，也许由于宋代以后文体区分得更细，人们的研究较古代更为深入的缘故吧。

综上所述，陈望道修辞思想是古人众多精湛理论的总结，是在批判地继承前贤遗产基础上所结出的硕果，这显然也就为修辞学开拓新里程，建立了一座丰碑。《发凡》的思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经久不衰，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二、陈望道修辞学体系和修辞学史研究

(一)“文之工者，美必兼两”说和陈望道修辞学体系

陈望道《发凡》的修辞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引下形成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有关文章中早有论述。②这里补充申述的是，《发凡》同时还接受了古代修辞思想中朴素辩证法的影响。

《发凡》论“跳脱”辞格时，曾引用清代魏禧《口录论文》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又论古乐府以跳脱断缺为古，是己。细求之，语虽不伦，意辄相属，但章法妙。人不觉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绝不相属者，都增减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盖意虽不属，而其节之长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乱也。……知此者可与读文矣。（第2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这段话指出“跳脱”虽然形式上是“断缺”了，但内容上的文章却仍紧密相连，“断”与“续”。还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实际上这段话仅仅是魏禧论述修辞辩证法所举的一个方面。

《日录论文》一开头即以“文之工者，美必兼两”来统帅。《发凡》论“跳脱”以引魏禧上述语录作为全文的结语，可见望道先生对魏禧朴素辩证法的重视。

《发凡》也曾称赞周钟游编的《文学津梁》，认为它是“在这一方面颇可备供参考的关于中国修辞古说的参考书。”③《文学津梁》中收有清刘熙载《艺概》中的《文概》。《文概》朴素的辩证思想十分突出，例如它指出：章法不难于断而难于续……明断，正取暗续也。《通史·近现代

卷》专门评述这句话体现了辩证法。《文概》中的辩证法思想与魏禧《口录论文》，甚至从先秦时期老子开始，历代均有传承的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十分重视吸取中国古代修辞理论遗产的陈望道先生，其修辞学体系中可以说是深深地打上了朴素辩证法的烙印。

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体系与其他学者所建立的修辞学体系显著区别之一。《发凡》的辩证法思想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望道先生的老友乐嗣炳先生曾回忆说：望道先生写作《发凡》时，是“长时间思索着修辞学理论的”。望道老先生生前也一再告诉我们这一点：讲修辞不能只讲辞格，也要讲理论。《发凡》建立的一系列修辞理论早已脍炙人口，如“调整语辞”说，“语辞形成的三境界”说、总结“条理”、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这些理论与修辞手法的两大分野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修辞理论中，“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又起着主导作用，它与其它理论也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2、既探讨积极修辞规律，也探讨消极修辞规律。《发凡》既探讨积极修辞中辞格与辞趣的规律，又把辞格分为四大类38格，然后逐格进行探讨。与此同时，还从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四个方面探讨消极修辞规律。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从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

3、既研究文言文修辞规律，又研究白话文修辞规律。刘大白在《发凡·序》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发凡》是“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语文今语文的修辞学书底第一部”。这就说明《发凡》既研究文言文修辞，也研究白话文修辞。望道先生在1962年《发凡·重印前言》中就回忆说：《发凡》当时的写作意图之一，是想同当时流行的“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的“偏见”进行“争论”，因此，《发凡》不但收有大量的典型的文言文例句，也有一部分白话文例句，并分别总结它们的规律。从这一角度也体现了作者辩证的思维观。

4、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

《发凡》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不仅在第一篇第一节，开宗明义地对不重视口语、压抑“语体”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批评，还进一步指出“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这就点明了口语是“源”，书面语是“流”。同时还认为，在表达形式上，“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书面语修辞与口语修辞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和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发凡》的体系从不少方面都体现了“文之工者，美必兼两”的观点。

(二)《发凡》对古今修辞理论的重视

《发凡》对古今修辞理论的重视程度，与同时代或比它早问世的修辞学专著相比，是较为罕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全书各个篇章中大量引用古今修辞理论并进行评论

如前所述，《发凡》引用古今修辞理论170多条，它们平均地分布在全书各个篇章中，不仅在《发凡》‘引言’、“结语”的理论探讨部分，引用得很多，即使在辞格、辞趣部分，也同样引用得不少。尤其对有些辞格，作者除了在正文中引夹叙、夹评外，还常常设立“附记”、“备览”等专门评述。这既表现了作者对前人修辞遗产的重视；同时也为全文增添了理论色彩。

《发凡》对大部分古今修辞理论是予以肯定或褒赞的，例如它曾对古代有些修辞理论褒奖有加：“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俞越的《古书疑义举例》，对于修辞研究所以比较地有贡献，也是因为他们极注重实例的缘故”。有时发现它们存在不当之处，也作出有力的批评。如论“引用”格时，曾引《高斋诗话》对王安石《桃源行》诗中有些语句引用不当进行抨击，《发凡》深表同意，说：“诗中却竟那样说，那就更应该严加批判了。”不论是褒赞还是批评，都表现了《发凡》对这些修辞理论是认真对待、非常重视的。

2、《发凡》“结语”，专论修辞学简史

《发凡》第十三篇“结语”简要地论述了汉语修辞发展演变史。作者把二千多年来的修辞学流变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萌芽时期，指先秦至”世纪末。特点是没有把修辞当作一种专科学术来研究。第二是“修辞文法混淆时期”，指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后至1919年“五四”运

动前。主要特点是修辞与文法混淆，“拿修辞论的材料混充文法”，如刘金第的《文法会通》等。这一时期修辞学的范围、界限虽然依旧不清，但已比以前明白了不少。第三是“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指1919年至1932年。这时修辞学渐渐独立，修辞学与文法的竞争业已结束，却开始了中外修辞学说的竞争。《发凡》以唐城的《修辞格》和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分别作为学习外国学说和继承中国修辞古说的代表。认为前者企图用外国修辞学说来解释中国修辞现象，后者力争用中国传统的修辞观来规律今后的修辞，“两面的业绩，都颇可观”，前者可使我们知道西方说述辞格的大概，后者也可使我们省些翻抄录旧书的烦劳。”

《发凡》“结语”专论修辞学史，虽较简略，但与30年代于《发凡》之后问世的其他修辞学著作相比(如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都列专章论述修辞学史)，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发凡》所论，完全是作者根据中国修辞学发展实际，独立概括出来的，与后几部书主要模仿日本学者写成不同。第二《发凡》论修辞学史部分与全书其他章节一样，参加当时“论争的气氛很重”，因此明显地详今略古，对“修辞文法混淆时期”与“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的不同学说与论点的得失，进行针锋相对地评论。等于进行了历史的总结。这一点不仅与《发凡》全书风格、体例完全一致，而且对修辞学今后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也是当时另外几本列专节论修辞史的著作不能比并的。

《发凡》专论修辞学史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为例，他于1933年底，就在《发凡》的影响下，编纂了一本古代专门辞格论资料，取名为《修辞讲话》。赵氏在《序》中说：“这本书名，……准确的说来，实在应该称为《修辞格探原》或《中国历代修辞论分类辑要》的”。其特点是“选集历来前贤对于修辞的议论，取来分类排比。”，⑤

说赵氏此书是在《发凡》影响下写成，理由有只：第一，该书《序》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讲修辞学，到现在为止，恐怕谁也不能超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陈望道在修辞学上的贡献的赞美，溢于言表。第二，《序》中又说：“凡是陈书所引用过的‘本书便不再引。”可见赵氏在编纂此书时，是时时与《发凡》作对照比较的。第三，此书完全采用了《发凡》辞格分类的体系，把辞格分为四大章二十七格，这四大章即《发凡》所区分的辞格的四大类。由于分类的体系性较强，《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评论此书是：“我国有一定科学体系的辞格资料专辑”、“对辞格理论史及辞格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发凡》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陈望道60年代论修辞学史研究

望道先生60年代在一些讲话中多次论及修辞学史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论我国修辞学研究“源远流长”，陈望道1961年3月18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讲话时提出：我写《修辞学发凡》也是为了反对复古。当时……我既把修辞提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同时还追溯修辞研究的历史，例如对辞格研究就是如此。我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修辞学，我国修辞学历史是否源远流长，《发凡》也作了一定的回答。(((陈望道修辞论文集》第2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点明《发凡》对修辞学史也有过一定的论述。1965年9月2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修辞的研究在我国也开始得很早，历史很长久……(同上，第310页)再次强调我国修辞研究的历史“很长久”，又“开始得很早”。《发凡》“结语”部分就曾论及《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观点。

2、论我国修辞学史有自己的特点

陈望道在上文中同时指出：修辞的研究在我国也开始得很早，……也有自己的特点，解放以后，修辞学在注重实用和普及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但深入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应当加强。特别象文体风格才面的研究很可以努力一番。(同上)

既指明我国古代修辞研究是“有自己的特点”，也指明解放后修辞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他在论述我国的风格研究时，也说：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研究的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的一宗宝贵的财富。我国研究风格包括语丈“体裁”的表现“体性”，是很早的……。不过我们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不一定是人家那个样子。……我们要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同上)。

认为我国风格研究与修辞研究一样，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它不同于外国的“那个样

子”。并建议要建立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

3、论研究“史”的目的和途径

关于研究“史”的目的，望道先生说：学米上也要提倡爱国主义，应当注意中国的学米史，要了解和总结我国古代以至近代在语文学术上的研究成就。这决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发展今天的研究。(同上)。

直接点明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古为今用。关于研究的途径，他说：第三步是确立古今中外的关系，决定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陈望道修辞论集》第287页)。“要”，来了“东西”怎么办？他在1965年9月20日的谈话中说：学习一切不可生搬硬套。问题是在于要能“化”。我们讲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米研究里面。我们怒，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的语言健康的发展。(同上书，第311页)。这里的“化”，就是批判地吸取，为我所用。

综上所述，可知望道先生60年代论修辞学史的论域宽广，能抓住特点针砭时弊。既富理论色彩，又对实际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修辞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

(一)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和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郑子瑜先生1965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⑦，1984年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都是最早问世的中国修辞学史专著。郑子瑜先生之所以走上研究修辞学尤其是研究修辞学史的道路，完全得益于《发凡》的滋润。这一点，郑子瑜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均一再阐述过。

(二)陈望道修辞思想哺育下的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

“十年动乱”后不久，1977年10月，望道先生与世长逝。先生去世后，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修辞研究人员在胡裕树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修辞学史的两个阶段：撰写修辞学史论文和撰写修辞学史专著。多角度、多侧面地撰写修辞学史系列论文：(1)断代修辞学史方面，有李金菩的《先秦修辞理论初探》、《宋代修辞理论的特点》、宗廷虎《论解放前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胡裕树、李熙宗《四十年来的修辞学研究》。(2)修辞学一个侧面的发展史方面，有李金荃《我国古代的比喻理论》、李熙宗《建国以来语体研究评述》(上)(下)等。(3)修辞学专著和古今学者的修辞观研究，有李金菩的《王充的修辞理论》、李行杰、陈光磊《中国古代语音修辞理论的卓越篇章——读刘韶〈文心雕龙·声律〉》、宗廷虎《我国古代戏曲修辞论的奇葩——金圣叹的评点修辞》、李嘉耀的《评〈古书疑义举例〉》等。(的修辞学史理论方面，有李金荃《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中有以下问题》，陈光磊的《关于修辞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宗廷虎、李金菩《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兼论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等。以上只是列举了部分论文篇目。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同仁仅发表在《〈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中的就有一批。散见于全国各个报刊，从不同角度研究修辞学史的论文有数十篇。

撰写的修辞学史专著有：易蒲、李金菩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宗廷虎联合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和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前三本为通史性质，后一本为断代史。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复旦的修辞学史研究呈现了全面铺开的特点，对全国修辞学史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从90年代初起就进入《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酝酿和撰写阶段。

(三)《中国修辞学通史》写作缘起与撰写原则

1.《通史》的写作缘起

如前所述，复旦大学的修辞学成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望道先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不断在我们耳际萦回：“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经过十年的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我们发现古代还有许多修辞理论宝藏远未被人们论及，过去的研究还嫌零碎，能不能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修辞学通史》，这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是为了完成望道先生的遗愿。1991年，宗廷虎向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谈了这一设想，并邀他来领衔当《通史》的第一主编。郑先生高瞻远瞩，慨然应允。于是即与吉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景良先生联系，得到张先生及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该社的努力下，这套书又被批准为国家“九五”重点

书目。经过八年的撰写，终于在1998年初完成全书撰写任务，并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该年年底出版。

2.《通史》的撰写原则

《通史》撰写过程中力图向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立足于社会大背景

修辞和修辞学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以修辞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史，当然与它们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密切了。因此《通史》将中国修辞学置于二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加强理论的探求和阐释

修辞学史的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不是书评的汇编，而是规律的探求和总结。但不论是史料的挖掘、著作的评析还是规律的总结，都离不开理论的导向。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理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修辞学史的研究中来，并以此为武器，对修辞学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求和阐释。这种理论性既集中地体现在《通史》“总论”及各卷各编的“结论”内，也体现在各卷的具体章节中。同时，在史的阐述中尽量将史和论结合起来。

第三，注意处理几种关系

C1)古今关系:重古详今，贯通古今。(2)点面关系:以每一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学说为重点章节，并与“面”相结合。(3)纵横关系:纵向，就是“历时”的研究。两千多年的修辞学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根长的链条。横向，就是“共时”的研究。每一历时阶段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又是长链条中的一个链环，它与前、后链均有传承关系。

四、研究修辞学史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意义

研究修辞学史的意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古代典籍的丰富，世所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蕴藏着众多精辟的修辞理论，有的业已发掘出来，反映在已经问世的修辞学史著作中;有的尚未被发掘和总结。即使如这部《通史》论及的，也只是这些典籍中不多的一部分。古代的修辞理论，虽然多是吉光片羽，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们与西方修辞学明显有别。更多地总结中国修辞学史的经验和规律，可使国内尤其是国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

的作用和地位，并为中外修辞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第二.为了社会发展中言语交际的需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总结运用修辞的历史经验，将直接给当前的运用提供启示，至少可适应以下不同需要:一是国内外和各民族之间人际交往的需要。二是政治形势和商品经济的需要。如法律诉讼、经贸往来、广告设计等，均需要了解语言运用的规律。三是科学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发展科学，振兴教育，无不与语言运用息息相关。四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需要、语言美的需要等。修辞学演进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适应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修辞学才能迅速发展。第三，为了推动修辞学当今的进一步繁荣和21世纪的新发展。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和现实是紧相连的，要促进现实更快地发展，必须搜集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继承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在真正的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心历史上有关修辞的论述，虽然探讨的是早已逝去了的史实，但却能给现实提供宝贵的借鉴，促进今后修辞学的更好前进。

① 陈望道1965年10月12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

②参见胡裕树、宗廷虎的《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修辞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修辞学研究》)(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③《修辞学发凡》第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④这三部书的“修辞学史”部分主要采用或参考了日本岛村沈太郎《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新文章讲话》中的某些观点写成，请参阅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第26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赵景深《修辞讲话·序》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⑥宗廷虎、李金菩《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第49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所1965年版。

⑧克罗奇《历史的理论和实践》,1923年英文本第26页.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第522页。

责任编辑 周延云

©2004-2005 版权所有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邮编: 266003

电话: 0532-82032739 0532-82032719 E-mail: xuebshk@ouc.edu.cn

Design by biner